

论铜罍与铜甗

张懋镕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本文从具有自名标识的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的铜罍与铜甗资料入手, 归纳出铜罍与铜甗相近和相异的九个特点, 进而从两者在形制、功能、组合以及流行时间、流行地域等方面的密切关系, 得出结论: 铜罍是从铜甗中派生出来的, 两者之间形成派生关系。至于有部分铜罍像陶罍, 那是铜器在发展过程中常见的仿陶行为, 并不能证明铜罍源自陶罍, 也难以成为否定两者之间派生关系的证据。

关键词: 铜罍 铜甗 派生关系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bronze *ling* and *lei* vessels from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o the middl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ocusing on artifacts with self-inscriptions. By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ronze *ling* and *lei* vessels, nine key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 in the article.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shape, function, assemblage, period of popularity,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bronze *ling* was derived from bronze *lei*, and there is a deriv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ome bronze *ling* vessels resemble pottery vessels. Thi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of bronze artifacts imitating pottery counterparts during their development. This cannot be used to prove that bronze *ling* originated from pottery ones, nor can it serve as evidence to refute the deriv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onze *ling* and *lei* vessels.

Key words: Bronze *ling* vessel; Bronze *lei* vessel; derivative relationship

《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刊登王洋、雷兴山的文章《论铜罍与陶罍》^[1], 认为铜罍是西周晚期仿自关中地区陶罍创造的器类, 主张将铜罍从铜甗中分离出来单独成为一种器类。2020年孙贤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东周青铜甗研究·兼论青铜罍、青铜浴缶》^[2]也持相近的观点, 认为铜甗在西周中期以后就消亡了, 铜罍与铜甗之间不存在派生关系。别开生面, 很有新意。我是说过铜罍是铜甗的派生物^[3], 但当时并没有做分析研究, 如今正好借此机会, 谈谈我的一点想法。

一、罍与甗的区分

要想谈铜罍的来源和铜甗的关系, 首先要掌握根本, 也就是要分清什么是铜罍, 什么是铜甗, 二者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在哪里。

因为很多铜罍有自名, 所以应先分析有自名的铜罍, 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 这是最合适也是很有说服力的方法。有自名的铜罍有13件, 见表一。

按照年代的早晚和形制的不同, 先将这13件罍分成甲、乙、丙3个组。甲组是西周晚期的仲义父罍和郑义伯罍, 乙组是西周晚期的膳夫吉父罍、伯夏父罍和进入春秋早期的曾伯文罍, 余下5件罍为丙组, 年代是春秋早中期。结合3组罍的年代顺序, 可以归纳出它们的特点:

1. 甲组罍初现时很像甗, 比较瘦高, 器高大于肩宽, 通高超过40厘米。乙组罍高度下降, 在40厘米以下。丙组罍逐渐变得低矮, 如伯亚臣罍(图三, 4)只有25.5厘米高, 且器高小于肩宽。

2. 甲组罍像甗, 比较厚重, 如仲义父罍(图一, 1)重14.43千克, 郑义伯罍(图一, 2)重9.66千克。乙组罍进入春秋时期, 体重减轻, 譬如曾伯文罍(图二, 3)通高36厘米, 与仲义父罍差别不是很大, 但重量只有6.2千克, 还不到仲义父罍的一半。丙组曾伯克父罍(图三, 2)通高35.4厘米, 重量也只有6.4千克。

3. 甲、乙两组罍像甗, 口径稍小一点, 在15厘

表一 有自名的铜罍

序号	器物	尺寸 通高×口径 (厘米)	重量 (千克)	铭文	时代	出处
1	仲义父罍	44×15.4	14.43	仲义父作旅罍	西周晚期	《铭图》 ^① 13999
2	仲义父罍	44.2×15.5	12.44	仲义父作旅罍	西周晚期	《铭图》14000
3	郑义伯罍	45.5×14.7	9.66	郑义伯作季姜罍	西周晚期	《铭图》14008
4	膳夫吉父罍	37.8×15.5	不详	膳父吉父作旅罍	西周晚期	《铭图》13994
5	膳夫吉父罍	37.2×15.7	不详	膳父吉父作旅罍	西周晚期	《铭图》13995
6	伯夏父罍	21.8×7.4	2.29	伯夏父作毕姬尊罍	西周晚期	《铭图》14001
7	伯夏父罍	21.8×7.4	不详	伯夏父作毕姬尊罍	西周晚期	《铭图》14002
8	曾伯文罍	36×15.5	6.2	唯曾伯文自作厥饮罍	春秋早期	《铭图》13993
9	京叔罍	33.5×15.4	不详	京叔夔嬴媵罍	西周晚期	《铭图续编》 ^② 0900
10	番伯官曾罍	23.5×18.3	6.78	唯番白(伯)官曾自乍(作)宝罍	春秋早期	《铭图》14006
11	曾伯克父罍	35.4×12.9	6.4	曾伯克父自作飮罍	春秋早期	《文物》 ^③ 2020.9
12	伯亚臣罍	25.5×20	9.3	黄孙须颈子伯亚臣自作罍	春秋早期	《铭图》14007
13	伯游父罍	36×25	不详	黄季氏伯马颈君游父作其尊罍	春秋中期	《铭图》14009

注：①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②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③方勤. 浅议回归的曾伯克父青铜器[J]. 文物，2020(9)：36—49.

米左右，丙组罍进入春秋时期有变化，有的罍口径变小，如曾伯克父罍，口径12.9厘米，有一部分罍口径变大，如伯亚臣罍口径20厘米，伯游父罍（图三，5）口径25厘米。

4. 甲组罍像甕，肩部基本是圆肩，如仲义父罍、郑义伯罍。乙组罍基本是折肩，如膳夫吉父罍（图二，1）、曾伯文罍。丙组罍有圆肩，如曾伯克父罍，也有折肩，如伯亚臣罍、伯游父罍。总的来说，圆肩罍少而折肩罍多。圆肩罍的年代略早于折肩罍，可知折肩是由圆肩演变过来的。

5. 罍的双耳多作向外斜伸状，也有部分罍无耳，如番伯官曾罍（图三，3）。罍的双耳比较小，绝大部分位置在肩部。12件有耳的罍，双耳都比较小，其中11件位置都在肩部，只有一件伯游父罍的双耳跨越肩腹交界线。所以耳是否在肩部也是一个重要的判别标准。

6. 甲、乙两组罍的腹部环收，丙组罍的腹部斜收，因此造成此时罍的足径小。

7. 大部分罍的腹下部没有鼻纽，只有个别罍的腹下部有鼻纽，如曾伯克父罍腹近底部有一环形鼻耳。

8. 甲组罍像甕，有圈足，乙、丙两组罍是无圈足或假圈足。13件自名为罍的铜器，除了早期的仲

义父罍和郑义伯罍，都没有圈足，带圈足的青铜罍应该是从带圈足的青铜甕发展过来的。所以有没有圈足应是判别铜罍的一个重要标准。

9. 甲、乙两组罍的纹饰都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如膳夫吉父罍的垂鳞纹，仲义父罍、郑义伯罍、伯夏父罍（图二，2）的重环纹、窃曲纹、垂鳞纹，只有丙组的1件曾伯克父罍的纹饰是波折纹和竖线纹，属于仿陶器。

有自名的甕有6件，见表二。

分析这6件甕，归纳出它们的特点：

1. 甕瘦高，除了昶伯夔父甕没有数据，5件甕的



图一 甲组铜罍
1. 仲义父罍 2. 郑义伯罍



图二 乙组铜罍
1. 滕夫吉父罍 2. 伯夏父罍 3. 曾伯文罍

通高在 30 厘米以上，2 件罍的通高在 40 厘米以上。器高大于肩宽。器高程度与第一组罍接近，但比大部分罍要高大。

2. 罍的体量厚重，在 7 千克以上，商代晚期的乃孙罍（图四，1）重 11.34 千克，西周中期的对罍更重达 18 千克。

3. 比起大部分罍来说，罍的口径大。对罍（图四，3）、陵方罍（图四，2）都比仲义父罍的口径大。

4. 商代晚期的罍是圆肩，如乃孙罍；西周早期的陵方罍也是圆肩。到了西周中期开始有变化，如洺御史罍（图四，4）还是圆肩，而昶伯夔父罍（图四，5）则接近折肩，与同时期罍相近。在春秋战国时期，罍还是以圆肩为多。

5. 罍的双耳比较大，耳的下端已经到达或超过肩腹交界处。如乃孙罍、对罍耳的下端已经到达肩腹交界处。

6. 腹部不同。西周时期，罍腹部环收，春秋以后，罍的腹部仍然环收，因此造成罍的足径大。

7. 罍腹下部有鼻纽。商代晚期的乃孙罍腹下部有鼻纽，西周早期的陵方罍也有鼻纽。

8. 殷墟二期之前的罍无

圈足，自殷墟二期开始有圈足，一直到西周晚期，如乃孙罍、对罍。春秋战国时期罍绝大部分有圈足，无圈足者少。

9. 罍的颈部通常饰涡纹、窃曲纹，腹部饰垂叶纹。

综上所述，罍和罍关系密切，两者的相同之处是：西周晚期的罍在器的高度高、器高与肩宽的比率、尺寸和重量、口径大小、双耳的位置、有圈足等方面与罍很接近。如果没有自名提醒，我们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

不同之处在于：春秋战国的罍在器高与肩宽的比率、尺寸和重量、口径大小、双耳的位置、有无圈足等方面与罍有了较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罍瘦高而罍矮胖，罍重而罍轻，罍多为圆肩而罍多为折肩，罍的双耳比较大而罍的双耳比较小，罍的腹部环收而罍的腹部斜收，罍有圈足而罍多无圈足或假圈足。

另外还有组合关系不同。根据王宏的《中国古

另外还有组合关系不同。根据王宏的《中国古



图三 丙组铜罍
1. 京叔罍 2. 曾伯克父罍 3. 番伯官曾罍 4. 伯亚臣罍 5. 伯游父罍

表二 有自名的铜罍

序号	器物	尺寸 通高×口径 (厘米)	重量 (千克)	铭文	时代	出处
1	乃孙罍	41.8×18	11.34	乃孙厥作且甲罍	商代晚期	《铭图》13823
2	陵方罍	38.2×(14.7-13.8)	7.793	陵作父日己宝罍	西周早期	《铭图》13817
3	洺御史罍	33.3	9.9	洺御史作尊罍	西周中期	《铭图》13827
4	洺御史罍	33.3	不详	洺御史作尊罍	西周中期	《铭图》13828
5	对罍	46×23	18	对作文考日癸宝尊罍	西周中期	《铭图》13829
6	昶伯夔父罍	不详	不详	昶伯夔父作宝罍	春秋早期	《铭图》13826

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罍卷》(下简称《青铜罍卷》)^[4]的研究,在墓葬中,青铜罍往往成对出现,在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的28座墓葬中,有17座墓葬出土2件或2件以上的罍(见该书附表八)。由于青铜罍是大型酒器,所以在墓葬中一般以单件的形式出现。据统计,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只有安阳殷墟妇好墓(墓室面积22.4平方米)、江陵万城西周墓(墓室面积不详)、宝鸡石鼓山4号墓(墓室面积13.3平方米)、湖北随州叶家山27(墓室面积33.66平方米)和111号墓(墓室面积138.57平方米)出土成对的罍^[5]。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只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二号墓等极少数墓葬出土成对的罍。所以根据墓葬出土的罍或罍是否成对,可以成为区别是罍还是罍的参考标准。如果墓葬出土的器物像罍,而且成对的话,是罍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墓葬出土的器物像罍,而且是单件的话,是罍的可能性很大。

以上我们谈了区分罍与罍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这九种方法不是绝对的,不能用其中一两点来作判定,必须综合一起分析。譬如我们说罍大罍小,但是也有个别的罍很大,与罍一样,碰到这种情形,就要从其他方面来判定了。下面运用九种方法就几件有争议的罍和罍谈一点想法,供大家参考。

1. 邳伯夏子罍(2件)(图

五,1),春秋晚期器,通高28.5、口径21.3厘米,重10.1千克。铭曰:“佳正月初吉丁亥,邳伯夏子自作尊罍,用祈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铭图》14089)

需要说明的是邳伯夏子罍虽然自名为罍,却和伯亚臣罍非常相似。第一,两者都是矮胖形体,器高小于肩宽,邳伯夏子罍通高28.5厘米,伯亚臣罍通高25.5厘米;第二,重量也很接近,邳伯夏子罍10.1千克,伯亚臣罍9.3千克;第三,两者口径都比较大,邳伯夏子罍21.3厘米,伯亚臣罍20厘米;第



图四 自名铜罍

1. 乃孙罍 2. 陵方罍 3. 对罍 4. 洺御史罍 5. 昶伯夔父罍



图五 铜罍与铜甗

1. 邳伯夏子甗 2. 蟠螭纹甗 3. 蟠螭纹甗 4. 素面罍 5. 刘家店子甗

四，腹部斜收，底径小；第五，两者都没有圈足。《铭图》将邳伯夏子甗归入缶类，也是因为发现它与甗距离较远。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简称《综论》）将其归为甗，是直接按照自名来安排^[6]。《青铜甗卷》已经将它归为罍器，是有道理的。至此，统计数据需要修改，罍自名为甗者只有6件。自名为甗，如同盥自名为簋，卣自名为壶，正是作为派生物的甗与作为被派生物的罍之间关系的绝妙证明。

2. 河南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蟠螭纹甗^[7]（图五，2），春秋中期器，《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1》27（下简称《全集》）认为是甗^[8]，《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河南下》404也认为是甗（下简称《出土全集》）^[9]，《青铜甗卷》归在罍里。此器高41、口径29.5厘米，形体高大，口径亦大，又是圆肩，腹部环收，有矮圈足，符合甗的标准。《全集》和《出土全集》的认识是对的。与郑公大墓蟠螭纹甗相近的器物还有山西太原金胜村出土的蟠螭纹甗，春秋晚期器^[10]（图五，3），高36.3、口径17.2厘米，重

12.5千克。《全集·东周2》49~50认为是甗，《出土全集·山西下》346也认为是甗，陈佩芬的《中国青铜器辞典》518认为是罍^[11]。此器形体高大厚重，又是圆肩，腹部环收，符合甗的标准。

3. 1954—1955年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4号墓出土素面罍2件（M4:36、37）^[12]（图五，4）通高26.8、最大径28.6厘米。《综论》211页认为是甗，《青铜甗卷》归在罍里。此器不高，而且器高小于肩的宽度，双耳较小，腹部斜收，底径小，和伯亚臣罍相似，符合罍的标准。素面罍2件同出，也符合

前面提出的组合关系定名法，所以《青铜甗卷》的判断较有说服力。

4.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二号墓出土甗2件，简报写作“缶甗”^[13]（图五，5），马承源的《中国青铜器》也认为是罍^[14]，其理由是与西周晚期的仲义父罍相似。问题是仲义父罍这样的罍存在于西周晚期，如前所言，到了春秋中期，罍的形体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似乎不宜类比。刘家店子这件器通高54、口径22.7厘米，可见器体高大，而且是圆肩，双耳较大，下端已经跨越颈与腹交界处，腹部环收，尤其是圈足较高且外撇，这种圈足见于铜甗中，绝不见于罍类器，《青铜甗卷》改为甗是对的。



图六 琏生尊



图七 召伯虎盨

二、铜罍和铜甬是派生关系

只有将铜罍与铜甬基本上区分之后，我们才能谈铜罍的来源，铜罍与铜甬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曾经提出鉴定是否符合派生物与被派生物关系的四个条件^[5]：

1. 二者的形态是否相近，功能和用途是否相同或相近。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铜罍在开始出现时即西周晚期（第一期），究竟是与铜甬相近还是与陶罍相近？如前所述，甲组罍是年代最早的铜罍，其形制、尺寸大小、重量等方面都和西周中期的铜甬相近。乙组罍与甲组罍非常相似，只是后一组少了个圈足。考虑到春秋战国的铜罍大多没有圈足，可知无圈足的铜罍年代要晚于有圈足的铜罍。无圈足的铜罍数量多，流行时间长，型式也比有圈足的铜罍丰富，显然无圈足的铜罍是主流形态。西周晚期的无圈足的铜罍虽然有变化，但总体来说和同时期铜甬接近，仍然看不到它们和陶罍有什么关系。无圈足的铜罍是由有圈足的铜罍演变来的，这一演变轨迹本身就将所谓铜罍源自陶罍的路径堵住了。

概言之，刚诞生的铜罍在形制、通高、重量、纹饰方面上就与铜甬非常相似，超过了铜罍与其他器类的相似程度，这是铜罍成为被派生物的关键。

其次，丙组铜罍与甲、乙两组铜罍相比，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颈部变得细长，肩部变宽而腹部变浅，整体显得矮胖。如曾伯克父罍、1972年随县熊家老湾罍、1969年烟台上乔村残墓罍，一是颈部有一圈凸棱，是西周晚期高领双耳罐的特征；二是器身饰波折纹夹竖线纹，这种纹饰在青铜器上少见，却常见于西周陶器，是仿陶装饰。但问题是这不能成为铜罍来源于陶罍的理由。第一，丙组铜罍年代基本上都已经晚至春秋，它们显然已经失去了充当铜罍祖先的资格，没有什么条件再去彰显自己的渊源。第二，这些铜罍都出土在中原以外山东半岛和汉水流域，而铜罍与铜甬在中原地区始终有一条从西周到战国的发展轨迹，所以这些边远地区的铜罍对于整个铜罍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

再次，年代更晚一点的伯亚父罍、伯游父罍，作为春秋中晚期铜罍，此时的铜罍没有了春秋早期的仿陶装饰，似乎又回到甬的早期形态，或者颈部和上腹部饰交龙纹，或者素面，与同时期青铜器纹

饰接近，与陶罍纹饰无关。

总而言之，无论在铜罍初现阶段，还是在晚期发展阶段，在形制、纹饰方面都看不到它们与陶罍有什么联系。仅仅在发展中有一部分铜罍在形制和装饰方面接近陶罍。这种仿陶现象在青铜器类中很普遍，譬如同样是西周晚期的尊，珣生尊就是仿陶尊（《铭图》11816、11817），而且纹饰与陶罍上的纹饰几乎一样，也是波折纹和竖线纹（图六），但不足以说明这一类器物源自陶器。

另外说一下组合情况。如前所述，在商代晚期，甬通常以单件的形式出现在墓葬组合中，只有特别高级的墓葬才出现2件一组的形式，譬如妇好墓。这是因为甬是体量最大的酒器器类，同样体量很大的酒器壶也是如此。到了西周早期，情况有所变化，甬会以一对一组的形式出现，原因是随着周人禁止酗酒而酒器器类如爵、觚、觶、斝、尊、卣减少和消亡，酒器只剩下甬与壶，在器类减少的情况下，为了彰显不同阶层的高低，增加数量是很好的选择，所以不仅对甬现象常见，对壶现象也常见。相对而言，出土2件罍的墓葬要多一些，这大概是由于罍的体量要比甬小一些。当罍从西周晚期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甬的位置时，自然也会以对罍的形式出现，这未必与一组2件陶罍有多大关系。

2. 派生物是否流行时间长，被派生物是否流行时间短。

如前所述，铜甬流行时间长，从商代到战国，并没有在西周晚期或者春秋时期中断发展，而铜罍流行时间较短，从西周晚期到战国。说铜甬在西周中期以后消亡的研究者可能没有关注1件重要的西周晚期铜器——函皇父簋（《铭图》5080~5082），其铭曰：“函皇父作周妘盂尊器鼎簋一具，自豕鼎降十又一，簋八、两甬、两壶，周妘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引人注目的是函皇父为夫人周妘所做礼器中有2件甬，2件壶。同为酒器，甬排在壶前面，可见甬在西周晚期的重要性。由此也可以证明，西周中期以后铜甬虽然很少，但并没有消亡，空缺处正好由被派生物铜罍来替代。前面所举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蟠螭纹甬和太原金胜村出土的蟠螭纹甬，也显示出铜甬在后期发展中依然强势不减。

3. 派生物是否流行地区广，被派生物是否流行地区有限。

参考《青铜甬卷》做的附表四，显示青铜罍从

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流行于陕西（凤翔、扶风）、湖北（枣阳、随县）、山东（烟台、栖霞、莒县、枣庄、安丘、沂源、沂水、莱阳）、河北怀来、北京延庆和河南（洛阳、潢川、光山、三门峡、郟县、桐柏、鄆城），流行范围有限。

参考《青铜罍卷》做的附表一，显示青铜罍从商代早期到战国流行于河南（郑州、安阳、罗山、武陟、洛阳、鹿邑）、山西（平陆、翼城）、湖北黄陂、陕西（城固、洋县、清涧、岐山、扶风、武功、泾阳、宝鸡、陇县、凤翔、西安）、辽宁（喀左、凌源）、山东（寿光、青州、益都、滕州、费县、长清、枣庄、沂水）、湖北（随县、江陵、武汉）、山西（灵石、曲沃）、湖南宁乡、安徽东至、广西贺州、北京、湖南（桃源、湘阴）、四川（彭县、茂县、汶川、成都、新都）、内蒙宁城、广西（陆川、宾阳）和安徽桐城，流行地区非常广泛。

4. 被派生物可以拥有派生物的名称，如邳伯夏子罍（《铭图》14089 ~ 14090）却自名为罍，就是因为这个器确实与罍像，所以它应该是罍，作为被派生物，可以用派生物的名称。

在漫长的商周时期，体量大的酒器就是罍（包括罍）、尊、壶。我们已经撰文具体分析过，罍要比尊大，与壶接近^[16]。当尊在西周中期以后消失，罍和壶成了最显赫的两类酒器。能成为派生物的器类往往是最有影响力的器类。壶从商代早期开始出现，一直发展到两汉，流行时间长，流行地域广，影响力很大，所以在商代晚期派生出新的一类器物——铜卣。在食器里面，青铜簋从商代早期开始出现，一直发展到战国晚期，流行时间长，流行地域广，影响力很大，所以在西周中期派生出新的一类器物——青铜盥。罍在商代和西周早中期影响力比壶、簋还要大，派生出新的器类在情理之中。

或许有人会问，春秋时期的青铜罍已经与罍有了很大差别，不能和罍形成派生关系。诚然，罍只是西周晚期与罍很接近，以后差别越来越大了，但是我们看看盥与簋的关系就清楚了。西周中期盥刚诞生时，与簋很接近，但是到了西周晚期就变化了，召伯虎盥就像一件方鼎（图七），难怪有人主张盥是从鼎变来的。

三、结语

李零近来写文章谈到青铜器的分类问题，特别

说到分类不要太细，我很赞同他的观点^[17]。他在谈到罍时，没有说到罍，可见他是把罍归入罍中的。过去强调分类要细，是因为还处在研究的初级阶段，首要的问题是大体上分清彼此。如今器类的划分大致清楚了，进一步的研究是要了解各种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如此，不能真正认识每一类青铜器的性质。譬如我曾撰文说卣是从壶中分离出来的一类酒器，卣是壶的派生物，与陶器没有什么关系^[18]。近年来王祁撰文做了详细的分析，很有说服力^[19]。至此，卣是壶的派生物的观点就可以成立了。像罍这类青铜器，数量不多，可以划归到青铜罍中，即使独立出来，也要明白罍与罍的密切关系，这样才有利于学术研究。

2025年元旦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寓所

致谢：资料收集得到王宏、刘树满博士的帮助，谨致谢忱。

注释：

- [1] 王洋，雷兴山. 论铜罍与陶罍[J]. 江汉考古, 2021(6): 197 - 205.
- [2] 孙贤. 东周青铜罍研究·兼论青铜罍、青铜浴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0: 26.
- [3] 张懋镕. 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M] // 张懋镕.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135; 张懋镕. 简论仿陶铜器与非仿陶铜器[M] // 张懋镕.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171.
- [4] 王宏.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罍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 [5] 张懋镕. 关于四川彭州竹瓦街出土“列罍”问题的再研究[J]. 文博, 2024(3): 85 - 90.
- [6] 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4.
- [7] 孙海波. 新郑彝器[M]. 河南通志文物志影印本, 1937.
- [8]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 中国青铜器全集[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 1998.
- [9] 李伯谦, 主编.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局, 2018.

(下转第 35 页)

- 简报 [J]. 中原文物, 2021 (5): 23 — 38.
-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南交口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94 — 185.
- [3] 中国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 庙底沟与三里桥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24 — 54.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等.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试掘简报 [J]. 考古, 2001 (11): 3 — 1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 2001 年春发掘简报 [J]. 华夏考古, 2002 (2): 31 — 52, 92 — 117.
- [5]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大河村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313 — 381.
- [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洛阳王湾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42 — 69.
- [7]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垣曲县博物馆. 垣曲古城东关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126 — 159.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 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 [J]. 考古学报, 1973 (1): 1 — 63, 157 — 178.
- [9] 湖北省文物局等. 郧县大寺遗址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0: 264 — 337.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青龙泉与大寺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58 — 114.
- [11]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 河南淅川县沟湾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J]. 考古, 2018 (10): 53 — 59.
- [12]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 河南省南阳市文物研究所. 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简报 [J]. 文物, 1998 (9): 31 — 45.
- [13] 北京大学考古系, 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 河南邓州市八里岗遗址 1992 年的发掘与收获 [J]. 考古, 1997 (12): 1 — 7.
- [1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十堰市博物馆. 2008 年湖北省丹江口市观音坪遗址发掘报告 [J]. 江汉考古, 2010 (2): 17 — 26.
- [15] 魏兴涛.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J]. 华夏考古, 2012 (2): 25 — 46.

责任编辑: 李唐

(上接第 77 页)

- [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太原晋国赵卿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57 — 66.
- [11] 陈佩芬. 中国青铜器辞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洛阳中州路·西工段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93, 图版 52.2.
- [13]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沂水县文物管理站.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 [J]. 文物, 1984 (9): 1 — 10.
- [14] 马承源. 中国青铜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237 — 238.
- [15] 张懋镕. 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 [M] // 张懋镕.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 (第二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135.
- [16] 张懋镕. 青铜器轻重论——从诸侯国青铜器的轻重谈起 [M] // 张懋镕.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 (第六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185 — 186.
- [17] 李零. 商周铜礼器分类的再认识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0 (11): 21 — 36.
- [18] 张懋镕. 青铜器定名的新方法: 组合关系定名法 [M] // 张懋镕, 主编. 马军霞, 著.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卣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 [19] 王祁. 商周铜尊卣配对组合研究 [J]. 考古, 2019 (3): 81 — 92.

责任编辑: 李唐